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21

红色经典音乐的美学意蕴及其育人价值

殷英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红色经典音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滋养,其内含的主客观兼和的真实性、合乎实践目的的善,以及真与善相统一的美,共同构成其“真善美”合一的美学意蕴。在“真善美”对应“知情意”三位一体的框架下,体现了提升审美主体历史认知、引起审美主体情感升华和坚定审美主体理性意志的育人价值。新时代的红色经典音乐应追求全方位创新,丰富艺术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更好地展现美学意蕴、发挥育人价值。

关键词:红色经典;音乐;美学;育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172-06

红色音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音乐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创作的,对革命起推动作用,为民众喜爱和传唱的音乐作品,同时也包括在新时期产生的对国家和人民精神面貌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的演绎形态。”^①红色音乐是革命年代的产物和延续,它的演绎形态囊括了歌曲、歌剧、戏剧、器乐等各个门类。红色经典音乐是红色音乐中的“经典”部分,它是经受了实践检验“广为流传的音乐艺术精品”^②,具有典型性且影响深远。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③,红色经典音乐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情感塑造和育人功能。

早前对于红色经典音乐育人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具体教育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实现路径的探讨,而对红色经典音乐的育人功能何以实现的问题鲜有论及。实际上,红色经典音乐育人功能的实现是以其自身所蕴含的艺术内涵和美学意蕴为前提的。本文即从美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红色经典音乐的美学意蕴是什

么,以及美学意蕴如何实现其育人功能。从而进一步阐释,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展现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特质、更有效发挥其育人价值等问题。

一 红色经典音乐的美学意蕴

红色经典音乐作品在我国百余年来之所以能够久唱不衰、广泛流传,并在我国革命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其根本原因便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以及美学属性——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由邓中夏创作的《五一纪念歌》中“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除尽”的壮美,还是由贺敬之、马可创作的《南泥湾》中“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的优美。它总是催人振奋,抑或令人安和,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直观地感受直抵心灵的音乐艺术之美。这种艺术的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④,而美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美的创造与欣赏在社会生活中的

收稿日期:2022-05-1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ZDB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YSB016)

作者简介:殷英(1980—),女,湖南益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音乐听觉的教学与美学理论的研究。

①李小兵,谢雪文:《20世纪后半叶中国红色音乐的表述特征及其教育价值》,《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②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页。

④《王朝闻全集(第8卷)》,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特殊作用,更是与真和善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①。因而社会生活中美的事物必然同时包含着真和善,“美是真和善和谐的、自由的、统一的形式,是真善形象的体现”^②。层层剥开红色经典音乐形式的外衣和其他外部表征,转向内聚焦于深层机理,便能窥见内含的“真善美合一”的美学意蕴。

(一)主客观兼和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艺术的最基本的审美要求……艺术的‘真’最基本的要求是既能反映和揭示出社会现实和历史上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又能包含作者的真情实感,反映和表达人们普遍的社会理想和理想人格及其情感意志和愿望。”^③因此,红色经典音乐之真实性,即作为客观存在的“生活真实”和经由主观创造的“艺术真实”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一是真实的生活是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之源。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④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⑤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者无不都是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切身体会、同人民群众的深度交往中获得创作灵感的。例如,被称为“不朽的真理之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便是曹火星亲身体会到彼时彼刻水深火热的抗战生活以及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情感,

并结合自身抗战经历创作而成。他曾回忆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⑥

二是生活真实只有经由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才能将之升华为艺术真实。苏联文艺理论家布鲁道娃曾提出:艺术知觉的形成要经由三个阶段,即通过外界刺激能量对人的直接作用引起的“直接反应”阶段;通过某种社会审美准则去完成的“沟通阶段”;以及通过沟通阶段把从对象事物中所取得的那些印象吸收到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中,从而获得个人的性质的“个人性质”阶段^⑦。该理论强调人的审美经验以及主体的主观感受,尽管这些主观感受的来源、审美经验的积累,无不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经历,但这也正好体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殊关系。因而,红色经典音乐的真实性便是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切身体会与真实表征。这种通过红色经典音乐反映出来的艺术真实“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⑧,自然也更具美的属性。

(二)合乎实践目的性的善

艺术的美离不开善,善是美的另一种意蕴。鲁迅在《艺术论》译本序言中说:“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美底愉快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就不见得美了。”^⑨这种功用性,便是善。简而言之,符合人的实践目的性的东西就是善的,而“就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并推动着社会发展的普遍利益才是真正的善”^⑩。红色经典音乐的一个重要功利性即在于在不同时代“鼓舞人们改造世界的信

①朱存明,王海龙:《美学理论百题》,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②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③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0页。

⑤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⑥吴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前前后后》,《湘潮》2010年第2期。

⑦B.布鲁道娃:《艺术知觉的三个阶段》,中央音乐学院教材科1980年油印稿。转引自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页。

⑨《鲁迅全集(第17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⑩《王朝闻全集(第8卷)》,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心和热情”以及“增强人们改造世界的智慧才能和力量”^①。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红色经典音乐记录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伟大实践活动。正因为有着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参与和推动,红色经典音乐创作主体的创作丰富也形成强烈地共鸣。

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改组建立的工农剧社的简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激发群众革命的热情,介绍并发扬无产阶级的艺术”^②,将音乐艺术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九一八”事变后,“左翼”音乐工作者及其组织联合成立了抗日歌咏团体,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创作了一批抗日救亡歌曲,在抗战前线和大后方掀起了抗战歌咏热潮,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念。再如,经典红色歌曲《沂蒙山小调》这首淳朴易懂的文艺作品创作之初就被反动势力施压,但这首歌“在人们最危难的时刻给人以力量,传递着理想与信念……陪伴着战争中的人们走出了黑暗,迎来了光明”^③;这些无不体现出红色经典音乐中所潜藏的“功利倾向”,也即其善的表征。无论在哪一时期,红色经典音乐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都是与不同时期地社会发展目的相一致的,其实践活动具有合目的性,因而自然是善的、美的。

(三)真与善相统一的美

红色经典音乐的美是真与善相统一的结果,是真与善形象的体现,“只有当人在实践中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规律(真),并运用于实践,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实现了善,才会有美的存在”^④。因此,红色经典音乐的美作为真与善的外部表征,是通过具体的曲体结构、旋律、节奏、调式调性等外在的音乐语言或符号来表现其所蕴含的真与善。就美的形式而言,红色经典音乐的美是其创作主体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一种以现实美为基础的艺术美,是“社会生活美和自然美

的能动的反映……它既是社会美和自然美的形象再现,又是艺术家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生动表现……具有意识形态性,是来自生活实践而又高于生活的美”^⑤。这种艺术美不仅来源于客观的生活实际,而且也反作用于现实生活——“它不仅加深和敏锐着人们对现实中的美的感受和领会,而且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通过人们的审美意识而反作用于人们的行动,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从而更进一步推动现实美的不断前进。”^⑥如身处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两大主要矛盾之中的近代中国,音乐创作主体为了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意识、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自救,创作了诸如《土地革命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松花江上》等一大批红色经典音乐作品,这些作品都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都具有真和善的美学意蕴。而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也确实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情绪,鼓舞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推动了革命活动的进行和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

从红色经典音乐中展现的美的不同状态、面貌和特征来看,又有崇高、优美、悲剧等具体形态之别。不同的审美形态、审美风格会带给审美主体不同的审美体验。崇高“是一种庄严宏伟的美,是一种以力量和气势取胜的美,是一种显示主体实践严重斗争和动人心魄的美,又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作用的伟大美”^⑦。红色经典音乐的崇高美给人以慷慨激昂、刚健雄浑的审美感受。如冼星海创作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极富号召性的、战斗性的进行曲,“以鲜明有力的节奏和富于棱角性的、宽阔的旋律,来表现一种坚决果敢的气势和激昂慷慨的情绪”^⑧。《咱们工人有力量》以铿锵有力的歌词和坚定的切分节奏,加之合唱的雄伟气势,体现出“工人阶级沉着坚毅的性格与改造世界的宏伟气魄”^⑨,这都是一种崇高美的表达。与崇高美相比,红色经典音乐的优美则给人以安宁和谐的审

①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②柯华:《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481页。

③李秋菊:《浅析〈沂蒙山小调〉的艺术特点》,《音乐创作》2013年第12期。

④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⑤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⑥《王朝闻全集(第8卷)》,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⑦杨安仑:《美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⑧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⑨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美感受。如《让我们荡起双桨》以抒情优美、层次分明的曲调表现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积极向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景象。此外,红色经典音乐中也包含有悲剧的审美形态,但这种悲剧“必须是能使人奋发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快的”^①。经典剧目《白毛女》便是典型个例,它通过《北风吹》《十里风雪》等唱段哀婉且深刻揭示了“把人逼成鬼”的旧社会的悲剧性,以之彰显“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必然性和审美感召。

二 红色经典音乐的育人价值

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历史共识,这也是美的功利性所在,“艺术以美的力量打动情感征服人心”^②。近现代以来的红色经典音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而逐渐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鼓舞民众、教育民众、团结斗争的积极作用。红色经典音乐所内含的“真善美”及其所对应的“知情意”共同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审美教育观念,凸显了红色经典音乐的育人价值。

(一) 提升审美主体的历史认知

红色经典音乐的育人价值之一便在于提升审美主体的历史和理性认知能力。认知“是主体对客体积极能动的思考、探索和理性把握……它总是一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的积淀,它对主体实践活动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③。红色经典音乐有助于审美主体理性把握百余年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真实历史,其所蕴含的大量的、真实的、深刻的历史叙事对于当前丰富“四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④红色经典音乐中蕴藏着丰富的“四史”教育资源,“与‘四史’教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一致”^⑤。同时,其本身的发展史也是党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红

色经典音乐的歌词内容都是其创作者根据彼时彼地的现实生活、奋斗实践等进行的真实书写,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能够准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同时,我们能从不同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中切实感受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历史进程。如《行军歌》《土地革命歌》《跟着毛委员》《盼红军》《妹妹送哥当红军》等革命歌曲,体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以及军民关系与斗争生活……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国革命现实与生活的画面与情境”^⑥;《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我的中国心》等歌曲则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万象更迭的社会面貌和时代气息。诸如此类,都能成为“四史”教育的优质内容资源。另一方面,红色经典音乐质朴简洁、内容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便于传唱的特点,扩展了“四史”教育的形式,更有助于“四史”教育的广泛、深入开展。如各高校、基层党组织等在建党节、国庆节等时间节点组织的“唱红歌·学四史”“学四史·庆国庆”红歌会等活动,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地促进了“四史”教育的开展。

(二) 促成审美主体的情感升华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情感“是指人们围绕各种东西的意义效应形成的体验态度,其中又主要包括了针对好价值的‘快乐喜爱’和针对坏价值的‘痛苦憎恨’”^⑦。音乐是一种通过声音传递或引起某种情感的艺术形式,其“擅长表现人的情感、情绪的状态及运动过程……是情感艺术”^⑧。因此,红色经典音乐育人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便是引起审美主体的情感升华,即通过音乐作品“引起(审美主体)想象和一系列的思想,而这些,因为与特定的个人的内在生活的关系,可能最终在感情上达到顶点”^⑨。审美主体在欣赏音乐作品时,往往会最大限度地把自己投入其中,通过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积淀的审美经验对音乐作品进行“解码”,进而将音乐作品内含的美的属性内化于心,以实现红色经典音乐的审美感召。

①《王朝闻全集(第8卷)》,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

②李振先:《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③刘永明:《知情意的实践论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21年第4期。

⑤任彦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色音乐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12期。

⑥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⑦刘清平:《认知能够凌驾于意志和情感之上吗?——“知情意”排序的解构与重构》,《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

⑧张亚卫:《浅谈音乐艺术的真、善、美》,《当代戏剧》2004年第S1期。

⑨L·B·迈尔:《音乐的情感与意义》,何乾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时期,红色经典音乐所引起的审美主体的情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由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和音乐创作目的所决定的^①。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以其壮美的内容、高亢的曲调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激起并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全国各地掀起了歌唱《我和我的祖国》的热潮,这首曲调优美、内容感人的红色经典音乐响彻大江南北,发挥了红色经典音乐的强大感染力,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我爱祖国的蓝天》等,唤起了人们的奋斗意识和敬业精神,激励着人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三) 坚定审美主体的理性意志

意志是“主体在一定理性支配下自觉地确定活动目的,并为实现预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②,坚定的意志有助于主体排除各种干扰因素而顺利地达成实践目的。这些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沃土、真实反映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奋斗历程的红色经典音乐,在坚定审美主体的理性意志方面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正是红色经典音乐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之所在。实际上,自红色经典音乐诞生以来,其一直发挥着理想信念塑造和价值引领的功用。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能从红色经典音乐中找到对应的精神养分。音乐的使命是教育人民达到精神上的和谐,“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受过这种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③。以红色经典音乐作为审美主体意志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极为“适合”的教育方式。凭借其独有的审美感召力、丰富的审美主题与内涵、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质朴易学的曲调内容,可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入开展,进而坚定审美

主体的理性意志,促使他们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如曾获得“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一等奖的《歌唱祖国》,“采用了颂歌体的写法,句式规整、音节响亮……曲式结构严谨,音乐在起承转合中以进行曲的速度展现出乐句的抑扬顿挫和对高潮的铺垫与推动”^④,一经传播便深受全国人民喜爱,成为红色经典音乐中的长青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志。

三 红色经典音乐的新时代发展路径

在文艺发展多元化、文艺传播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在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传播平台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成了红色经典音乐更好地展现其美学意蕴、发挥其育人价值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注重全历史书写,延展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播内容。红色经典音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审美对象的“记忆之场”^⑤,也就是说红色经典音乐“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召唤个体记忆的象征物……能唤起群众对不同历史年代的集体回忆,从而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道路的艰辛和不易,切实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⑥。因此,新时代红色经典音乐的创编工作应十分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全历史阶段的书写,以“真善美”“知情意”的统一为核心,充分展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实际和奋斗历程,以更好成为“四史”教育的栩栩如生、绘声绘色的教学内容库。此外,也要重视对当代史的书写,以时代的笔触记录当下的发展实况,以更好传承和发扬红色经典音乐的精神品质与审美价值。

其次,应追求全方位创新,丰富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音乐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音乐本身的形式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展。因此,新时期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工作,不能忽视对其艺术形式的创新。除了传统的民歌、群众歌曲、歌剧等形式外,还应结合新的群众审美特点,从音乐内

①殷瑛,于兰英:《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及其当代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刘永明:《知情意的实践论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③柏拉图:《理想国》,载《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9—30页。

④刘辉:《红色经典音乐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⑤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⑥任彦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色音乐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12期。

容、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如可采取交响曲的形式、运用交响化的语言塑造更加丰富多变的音乐形象,提升其叙事性和抒情性,扩展红色经典音乐的审美意境和想象空间。交响套曲《延安》由序曲和八个乐章构成,更形象深入地展现了延安作为革命圣地的地位和作用;交响曲《百年颂》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和情感讴歌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取材于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古筝协奏曲《英雄泪》充分发挥了古筝和交响乐的特点,展现出了百年来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精神气质。此外,还可采用跨界融合的形式,如可对经典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进行重新编排,“利用此剧原本街头卖艺的演出形式,结合当下流行的‘快闪’行为艺术”^①,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最后,应实现全媒体传播,拓宽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播渠道。红色经典音乐应全方位、全流程关注相应的传播对象,打造“全程”传播格局;“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信息或新闻消费需求”,打造“全息媒体”;通过“形塑传受一体化、混合型角色,强化大众参与感、体验感与责任感”,实现“全员”参与^②;并最终实现“全效媒体”,达到传播效果的

最大化。如中央民族乐团在推出新剧《唱支心歌给党听》的同时在快手平台发起“了不起的国乐”活动,邀请用户参与短视频创作和作品互动等,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万人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短视频,获得了高达3亿次的观看、近300万的点赞和超6万条评论,实现了与受众的有效互动。

结语

红色经典音乐扎根深厚的历史土壤,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具备延绵不绝的艺术美感和生命力,是最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音乐艺术形式之一。红色经典音乐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和审美表征,但其美学意蕴和育人价值则是不变的内涵。我们理应传承和发扬好红色经典音乐的优秀历史传统,创新其基于新时代、新需求的艺术内容、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与自我提升需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大局,有效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中国梦”的实现。

On Aesthetic Imp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Red Classic Music

YIN Y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he red classical music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nourish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harmony, the goodness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purpose, together with the beauty of the unity of truth and goodness constitute its aesthetic meaning of “the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i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knowledge, emotion and feelings”, it embodi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of aesthetic subjects, causing the emotional sublimation of aesthetic subje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ational will of aesthetic subjects. The red classical music in the new era should pursue all-round innovation, enrich art forms, broad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ter display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give a full play to educational value.

Key words: red classics; music; esthetics; educating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赵文慧:《红色音乐资源的历史样态与时代传承》,《上海艺术评论》2021年第2期。

②沈正赋:《“四全媒体”框架下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